

日本民俗学译丛

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

——柳田国男与民俗学

[日] 福田亚细男 著
於芳 王京 彭伟文 译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成果



學苑出版社

日本民俗学译丛之二

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

——柳田国男与民俗学

[日] 福田亚细男 著
於 芳 王 京 彭伟文 译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 / (日)福田亚细男著 ; 於芳, 王京, 彭伟文译. —北京 : 学苑出版社, 2010.7

ISBN 978 - 7 - 5077 - 3612 - 0

I. ①日… II. ①福… ②於… ③王… ④彭… III. ①民俗学 - 研究方法 - 日本 IV. ①K893.13 -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3118 号

出版人 : 孟 白

责任编辑 : 刘 丰 方晓喆

出版发行 :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 100079

网 址 :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 010 - 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印刷厂 : 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尺寸 : 880 × 1230 1/32

印 张 : 8.875

字 数 : 225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7.00 元

《日本民俗学译丛》序 一

本丛书共三卷，精选了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及其弟子在方法和内容上都有重要意义的文献，译成中文出版。希望能够成为关心日本民俗学的中国朋友，以及在中国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学者及学生们的他山之石。

日本的民俗学大约形成于百年之前。在 18 世纪，探究日本特有之文化的“国学”，以及 19 世纪后半由欧洲引进的人类学的“土俗研究”，可以说是日本民俗学的两大源头。但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学，却始自柳田国男 1908 年夏对九州地区山间村落的刀耕火种及原始狩猎方法进行的调查，以及同年秋他从出生于东北的一个青年那里收集流传于当地的种种奇闻逸话。后来，柳田与聚集于其门下的青年才俊们一起建立了民俗学研究组织，开展了研究活动。日本民俗学就这样作为“在野之学”发展起来。民俗学进入大学殿堂，是 1958 年以后的事。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日本民俗学变成了“象牙塔中的学问”。民俗学教育和研究基本上在大学中展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日本学习民俗学，要理解民俗学的体系，只要去阅读柳田国男的《乡土生活研究法》或《民间传承论》便可；而要研究具体问题，则去研习柳田国男论及这些问题的著作。可以说，民俗学的方法论凝缩于这两部著作之中。1934 年出版的《民间传承论》，其基础是前一年的 9 月起柳田每周在自己家中以其嫡系弟子为对象，做了前后三个月的专题讲座。因此，其内容民俗学研究的专门性较强。与此相对，1935 年出版的《乡土生活研究法》，同样以方法论为主要内容，但面向一般读者的概论性性质更为突出，对“救世助人”这一民俗学的社会使命

的强调也更为明确。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读了这两本书，便能够理解民俗学。即使在现在，这两本书也是了解柳田国男的学术理论，同时也是理解民俗学主要内容的基础文献。因此，本丛书将这两册书作为第一卷的内容。

第二卷是福田亚细男的《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该书出版于1984年，那时民俗学教育及研究已经基本在大学进行。这部著作是民俗学逐步脱离柳田国男的影响，开始独立发展的时期的成果。该书旨在通过对柳田国男民俗学理论的扬弃，探讨民俗学成为有着独立的研究对象及方法的独立科学的可能性。因而一反之前学界对柳田单方面肯定的潮流，指出柳田的思想之中存在着的问题和弱点，希望民俗学能够克服这些问题和弱点而走向成熟。书中有不少不足之处，但无疑显示出了柳田以后的民俗学的风貌。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出现了急剧的变化，民俗学也在种种努力之下，向着新的阶段迈进。年青一代的民俗学家们关心的课题更加广泛，诸如城市化、人口的不均衡、环境污染、社会歧视、贫困、民族纷争等问题都开始成为研究对象。课题、方法的多样性使得这一时期的民俗学研究呈现出略显混沌的景观，但混沌之中也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第三卷则选取了这个时期论文中较为出色的一部分。

百年以来，日本民俗学积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读者们会很容易地发现，日本民俗学与中国民俗学略有不同。19世纪中叶诞生于欧洲的民俗学，基本上是以故事、传说、民谣、世相传言等口头传承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无论是在其形成之初，还是现在，都是如此。因这一特点，我们不妨称之为“口头的民俗学”。不仅欧洲如此，美国也是一样，中国民俗学中的这一倾向也很强。而日本民俗学的研究，以生产活动、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岁时年节、信仰等为调查研究的主要对象，可以称之为“行为的民俗学”。虽然也记录口头的传承，但视其为把握行为的手段，主要目的在于解明行为的历史性发展和变迁。日本民俗学对田野调查十分重视。相信日本民俗学的这一特色，对中国民俗学也有

借鉴作用。

我期待着中日两国的民俗学学者，能够相互借鉴，相互刺激，并将研究视野拓宽到整个东亚，同心协力，将民俗学建设成为顺应 21 世纪时代潮流的学问。本丛书正是这样一种尝试。我衷心期待中国的学者和学生们能够从本丛书中有所获益。

福田亚细男

王 京 (译)

2009 年 10 月

《日本民俗学译丛》序二

今天，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史来说，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十套《民间文艺集成志书》胜利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四级名录体系正在建立健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顺利进行。以这些活动为标志，我们的民俗学、民间文学资料搜集工作已经有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整个学界正在为今后民俗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努力。

经过多年奋斗，全国各地高校开办了民俗学课程，有了相关专业，培养了大批硕士生、博士生，形成了从事民俗学研究的一支不小的队伍，这为今后的民俗学学术发展做了人才的储备。

要前进就要回头审视走过的道路，包括向国际学界借鉴的历程。这不单是为了总结过去，更多是为了开拓未来。

回顾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史，不能不看到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曾经受到外国民俗学的很大影响。单从借鉴的角度看，在发轫阶段，英国人类学派的潮流，曾为一些学界前辈所倚重。随后，日本学术著作的介绍，也对我国的民俗学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20世纪中叶有不短的一段时间，由于历史的原因，民俗学界效法苏联，在民间文学或称人民口头创作的研究方面有了某些推进。改革开放以后，美、日、俄、德等国民俗学的学术思想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推介。

当然，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历程中，几代前辈学人也都有自己可以称道的学术发现和理论贡献。

现在，我们的视野更开阔了，我们的思路更全面了，我们的方法也更多样了，研究成果日益增多，新人、新作、新见解、新

成就日益增盛，人心思发展，大家正呼唤着中国民俗学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版《日本民俗学译丛》，不仅是适时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过去，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在借鉴国外学术成就时，往往是通过一些不见经传的学者的著作。这些二三流的著作首先被翻译成中文，大家便当做经典加以引用和借鉴，有时甚至仅仅靠介绍和转述来了解顶尖学者的经典著作。对此我常常发出感慨。于此，我想到一则大家耳熟能详的典故。据《五灯会元》第四卷载，唐代高僧赵州禅师问新来的僧人：“曾到此间么？”僧人回答：“曾到。”禅师说：“吃茶去！”又问另一僧人，僧人回答说：“不曾到。”禅师也说：“吃茶去！”后来院主问：“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禅师召唤院主，院主应诺，禅师仍说：“吃茶去。”

欲借他山之石以攻我邦之错，或许可以翻用“吃茶去”的公案说：“读原著去！”而且要读经典原著。

现在出版的这套《日本民俗学译丛》，收录了日本民俗学各个时期的部分重要著作，约略而精要地勾勒出日本民俗学发展的历史。

柳田国男作为日本民俗学的拓荒者，开创了日本这一学术领域的先河。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著作被相当一部分追随者俨然看作是这一领域的圭臬之作和“不二法门”。

福田亚细男教授的《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作为日本民俗学发展新时代标志的代表性著作，对既往的研究历程作了反思，同时开启了日本民俗学继续发展的新路。

《日本民俗学译丛》的第三卷《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精选了二十几位学界精英的代表性著作，这些论文是对日本数十年来民俗学学思和新见的一种十分精准、宏阔而概要的反映，虽然不能说篇篇都是锦心绣口，但在各自时代都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直到今天，这些著作仍能对我国学术界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我觉得应该把《日本民俗学译丛》的三部书连贯在一起，认真研究、细细品味，会意文心当史读，定会有令人欣喜的收获。

中日两国民俗学界的学术交流、彼此借鉴，一定会为推进亚洲和世界的民俗学发展作出可贵的贡献。

最后，要感谢本书编者王晓葵、何彬两位教授，他们多年在日本学习和工作，对日本民俗学的发展有深入的了解，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们为这套书的筹划、编纂、翻译、审校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最可贵的是他们编纂此书的创意，他们通过这套文集，将带领我们完成对日本民俗学发展历程的一次极为有益的巡礼。这里还要特别感谢福田教授，他不仅在本书选目方面做了精心的指导，还多次组织编者在周末或假日集中到神奈川大学，解答日本民俗的相关问题和翻译中的疑难。他和编者们一起伏案作业，翻阅和查找资料，探讨和解析生僻的方言词汇。福田教授是中国民俗学会的老朋友，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和两国学界的交流多有贡献。这套译丛再次见证了他对中国民俗学界的深厚情谊。本丛书论著的各位作者，包括柳田先生的后代家人，都欣然同意无偿转让著作权。我们对所有作者以及日本弘文堂出版社表示敬意和谢意。参与翻译的年轻朋友，有的是中国留日的博士生，有的是曾经留学中国的日本年轻学者。他们虽然都从事民俗学研究，但都有繁忙的工作或学习任务，有他们的辛苦才换来我们阅读的愉快。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对文集的出版给予资助，位于京都的日本文化研究的权威机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还把本丛书的第一卷柳田国男的《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列入“日文研翻译出版资助项目”给与翻译费用的支持。功德无量，令人钦敬。

谨为序。

刘魁立

2010年2月26日

编者的话

这套《日本民俗学译丛》终于面世了。在从企画、选稿、翻译到最后出版的过程中，我们遇到过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出版计划甚至曾经面临夭折的危险。幸而得到了多方面众多人士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才度过了各种难关。对此，我们很感激也很欣慰。可以说，它是中日两国民俗学界共同努力的结晶。

首先，我们要感谢原著的作者和版权所有者。他们包括：柳田国男著作的版权人柳田富美子女士，《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的作者福田亚细男先生和出版社弘文堂，还有论文集《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的所有作者。他们都慨然允诺我们无偿翻译出版他们的著作。柳田富美子女士还帮助我们和成城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取得了联系，成城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向我们无偿提供了柳田国男先生珍贵的照片。

我们还要感谢所有的翻译者，他们在几乎没有报酬的条件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日方顾问、日本民俗学会原代表理事福田亚细男先生从企画阶段开始就事必躬亲，过问每一个细节。除了帮助联系版权事宜、推荐文稿，还专门抽出时间解答我们翻译中的问题。中方顾问、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先生一直关心本丛书的出版，在百忙中为本丛书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在这里，我们向这两位民俗学界的前辈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康保成教授主持将丛书纳入该中心的出版资助项目，为丛书的出版解决了部分资金的问题。本套丛书的第一卷《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还获得了位于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翻译出版项目

的资助。长期持续不懈地对民俗学支持的学苑出版社，鉴于丛书的学术价值，在资助有限的情况下，将其列入出版计划。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通过《日本民俗学译丛》的编辑和参与具体的翻译作业，我们从中学习到许多。也希望这套中文版《日本民俗学译丛》，为中国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读解日本民俗文化、了解日本民俗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原著依据。

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本丛书的出版比原计划推迟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责任编辑刘丰、方晓喆用他们的宽容和耐心，鼓励我们坚持到了最后。

编者
2010年3月

本书作者福田亚细男教授简介

何 彬

福田亚细男先生，日文名字写作“福田アジオ”，日文发音为“FUKUTA - AJIO”，因此曾被音译为“福田阿鸠”。尊重本人意向，在翻译本书时沿用了本人认可的译名“福田亚细男”。福田教授希望今后自己的名字写成中文时，只使用“福田亚细男”这一译名。

福田亚细男先生 1941 年 2 月生于日本三重县。1963 年毕业于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史学方法论专业，1971 年同大学文学部史学专业硕士毕业。历任武藏大学教授、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民俗研究部教授、新潟大学教授等，现为神奈川大学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教授。

福田教授几十年来主要从事村落民俗、民俗学史以及民俗学研究方法研究。先后发表数百篇论文，编著书几十册，与他人合著书或编辑辞典数十册（套）。主要著述有：《日本村落的民俗结构》、《村落社会新的可能性》、《时间民俗学·空间民俗学》、《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等，与他人合著的有《现代日本民俗学 I——意义与课题》、《现代日本民俗学 II——概念与方法》、《民俗学概论》、《民俗调查手册》、《民俗研究手册》、《日本民俗大辞典》、《民俗学简明辞典》等。

福田先生从学术史角度审视日本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对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提出的周圈论、重出立证法等民俗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周密的考察与分析之后，在《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等著述里对周圈论、重出立证法等作了客观的评述并进一步提出有关民俗学科研

究方法论的思考。

他在日本民俗学学术史研究以及民俗学方法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其时间和空间民俗论、柳田国男研究、民俗学目的论、资料论及方法论等多方面对日本民俗学理论具有较大影响。

作为现代日本民俗学著名学者之一，他曾多次担任日本民俗学会理事并被选举出任日本民俗学会代表理事（即会长）。

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他带领中日合作民俗调查团，在云南、贵州、江苏、浙江等地进行民俗实地考察，先后编写了《中国江南的民俗文化》、《中国浙江的民俗文化》、《中国浙南的民俗文化》等多册民俗调查报告集。

此外，他十分关注中国民俗学科的发展，先后为中国民俗学培养了多名博士留学生。他诲人不倦的教育态度、严格而有步骤的民俗学基本功训练方法，使留学生们受益匪浅。他所在的专业接受中方学者进修，或与相关大学、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对加深中日两国文化的相互理解，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作出了很大贡献。1998年，他应钟敬文先生特邀，为中国民俗学做专题演讲。1999年，他受日本政府派遣前往设在北京的日本学研究中心任教，讲授日本文化研究课程。福田教授获得中国民俗学会授予的“中国民俗学最佳贡献奖”，并被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名誉顾问称号。

代 序

钟敬文

福田教授 70 年代初毕业于日本东京教育大学。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在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民俗研究部专门从事民俗研究工作，后来在东京附近的新潟大学等几个大学教书，近年在神奈川大学当教授。他是日本当代一流的民俗学家，他的研究，继承了柳田国男民俗学的传统，同时，还进行了日本村落民俗学的研究。

日本从 30 年代到 60 年代，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柳田国男的民俗学一直占支配地位，可以说，当时整个日本民俗学的发展都是在他的指挥棒下进行的。到了 70 年代，形势有了变化。比较年轻一代的学者，如福田亚细男和宫田登教授等，不满足于三四十年来柳田先生已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而是继续发展，有所革新；但不是“革命”。所谓不是“革命”，就是说，他们不是全盘否定前辈的学术成就，而是在他的基础上，根据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往前走；从大量新发现的民间资料和严密的学术论证出发，对柳田国男的学说提出批评、修改的意见。这就既保持了日本民俗学发展的连续性，也增添了日本民俗学的学术活力。

日本学术界的一位老朋友估计，从目前看，日本民俗学已同文化人类学差不多了。我个人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全面地看，现在日本的民俗学还不是文化人类学。当然，搞文化人类学绝不是坏事，但它究竟是另一门学科。福田先生也同意我的说法。依我看，不妨说，出现了一些新的倾向，比如有一些民俗学者的研究带上了文化人类学的色彩；但整个日本民俗学并没有变成文化人类学，或者说被人类学所消灭，这是一个事实。两者

虽然是有一些关系的学科，但究竟是两种学科。

在日本现代民俗学的学坛上，福田教授和宫田登教授，堪称一个新起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这一派的书，我也看了一些，但年纪大了，看得很慢，我也用功不够，算不上一个好学生，但我是大略地知道一些的。比如说，他们的理论，在认识日本民俗学的范围、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是给予了相当拓展的。本世纪的上半期，柳田先生在确立自己的学说时，把它叫作乡土研究，或者民间传承，当时他没叫民俗学。这里面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他把注意力放在了“一战”后的日本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上，这使他的民俗学的对象范围，是以传统农村为主的。作为一种开拓，他的工作非常了不起。但从学科整体的体系构架看，它肯定是不完善的。日本自出现都市到现在，已有很长的历史，难道这些都市就没有民俗吗？如果有，它们能和农村的民俗完全一样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柳田先生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他其实也接触过这个方面，但他还是说，都市民俗学就是乡村民俗学的延伸，这就说明了他的学术兴趣和功力不在这个地方。现在大家学了民俗学，都知道，这种说法，从常识来讲，分明是不准确的。就拿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情况来讲，也是说不通的。中国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人口都是农民，到现在，由于多种经济的发展，职业人口的比例有所变化，但绝大多数还是农民。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也很早就发展了都市，春秋战国时的燕和赵这些地方，都有大都市。齐、鲁一带的都市，还发展得相当热闹，据说民宗百艺，“甚富而实”，这些在《战国策》和《史记》等文献里都有记载。它们后来已发展了一两千年，能说它们不再产生自己的民俗吗，那不可能。因此，拿都市和农村相比，在人口和地盘上，虽然过去相差悬殊，把农村比作一个大指头，都市只是一个小指头。但大指头虽然大，却慢慢地变化；小指头虽然小，却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理想的境界是，农村与都市，都要发展。农村不能总是落后，都市也绝不是农村的尾巴。像柳田国男这种农村一体化的观点，就不合适了。后来福田和宫田登教授等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

柳田国男民俗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主张一国民俗学。民俗学基本上是一国的。但由于人类生活的复杂性所决定，在“一国”的前提下，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需要讨论。比如，人们的生活经常要移动，在中国、日本和韩国各自“一国”的境内，就都有很多移民人口。他们随着历史上迁徙的足迹，把故土的文化也迁徙过去了；此外，还有别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往来等。仅从中国的情况来讲，就在两千多年前，与邻邦韩国和越南等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在彼此的人民成分、文化和政治上，都长期互相渗透、交流，这已成为一种历史。那么，要研究中国的民俗（当然我们也强调一国民俗学），对周边民族的民俗文化，就不好完全忽略了，这恐怕是民俗史本身的一种制约吧。

在日本，柳田国男先生主要研究大和民族。大和民族是日本的主体民族。但就在他开展研究活动的30年代，日本也还有自己的少数民族阿伊努，中国旧译为“虾夷”，他们同样是日本国民，柳田先生却不大重视这些。另外，在日本三岛以外的朝鲜、台湾，当时也属于日本殖民统治的管辖地，直到“二战”时期，相互还在政治、军事上存在一定的关系，柳田先生同样不大管这些。他只承认冲绳（琉球），认为冲绳人在血缘上与大和民族有关，是可以进行一国民俗的研究的。其实，这种看法也不是准确的。现在，福田教授等的研究，视野就开阔多了，研究的结论也比从前更为精细。像冲绳的民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日本本土的民俗文化相关联？又究竟有多少成分是受了中国明清文化的影响？北海道的阿伊努人作为日本的国民，在民俗上与大和民族到底有哪些异同点？他们都给予了一定的说明。

大家知道，从事学术研究，除了理论发明，建设方法论也是很重要的。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方法论也很有名，一个叫重出立证论，一个叫方言周圈论。当然，他还使用了其他一些广义的方法，这里就不讲了。仅从这两个方法来讲，它们在当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再好的方法，它的适用程度，也不是无限的。方法就是方法，它不是万金油。柳田国男作为日本民俗学的创始人，无疑是大师级的大学者。然而，任何伟大的人物都有限制，

柳田先生同样不能避免。所以，到了福田与宫田登他们这一代，就要对传统的民俗学方法加以批判、调整，重新来确立民俗学研究的科学手段和现代方法论了。

他们两位发展了柳田国男的民俗学，但在学问态度上，又是对柳田先生极为崇敬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好的学生是应该能作到对真理的尊重过于对老师的崇敬的。不过，说到福田教授，他还不是柳田国男先生的学生，而是他的学生的学生，第三辈。但在学术上讲，他是继柳田的传统之后，突出地向前的。前面说过，柳田时代的民俗学，以农村和农民为主体；但在福田和宫田登两位所主编的《日本民俗学概论》（1993）里，在第四部分《特论》中，就增设了“都市的民俗”的内容。当时其他日本民俗学著作都没有“都市”这一章。他们在方法论上，提倡地域民俗学，这和柳田国男相比，也是新的发展。现在，地域研究法，人类学也用，这几年在我国也很流行，但福田教授的优点是，在强调地域研究的同时，也注意进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这就使他能提出许多难得的创见。应该说明的是，柳田国男也搞比较，但比较的范围、方法，同福田不一样。

不仅对柳田这样的学术前辈，就是对一般的学者，只要是在某一点上作出了学术贡献的，福田教授同样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这种科学态度和学者胸怀，也是值得同学们学习的。日本有一位自学成才的马克思主义者、民俗学家，叫赤松启介，出版过一本《民俗学》，后来绝版了。此书再版时，福田教授认为它有价值，就撰文大加称赞。福田教授自己是学院出身，在学术上又有很大的名气，现在他当了日本民俗学会的主席，完全是靠学术实力赢得的社会地位，不像中国，可能有许多其他因素才能达到这个位置。但他并不因此而自视过高，反而还能真诚地肯定非学院出身的自学者，没有门户之见，没有学阀的霸气，这种学者的品格，也是高尚的。

福田先生是一个日本学者，但他对中国的民俗也很感兴趣，可能是因为中国同日本的关系比较密切吧。这几年，他差不多每年都到中国来调查，而且每一年都发表田野作业报告。他对中